

一个“有衣同穿”的故事

——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藏“方格子衣裙”不简单

侯文斌

抗战时期的重庆同美国华盛顿、英国伦敦、苏联莫斯科一起，被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历史名城。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结盟红岩，坚守初心使命，领导南方国统区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培育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位于嘉陵江畔的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与红岩村13号、曾家岩50号、桂园、《新华日报》旧址毗邻，都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活动基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心。

近日，笔者走进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解说员正给观众介绍一套衣裙。它是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衣裙分为上衣和裙子，衣长57厘米、宽49厘米，裙长71.5厘米、宽77厘米，重392克。其中，上衣为丝棉质地，米黄色底、双蓝竖条纹，整体呈小西装款式，款式简洁大方；裙子为藏青色毛呢制成的两片“A”字裙，裙摆过膝。整套衣裙色泽鲜艳、漂亮优雅。

抗战期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常见的是粗布单军装，今日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为何有这样一套衣裙呢？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相关负责人说：“这套衣裙看似普通，却承载和见证着厚重的红岩历史。从它身上，我们看到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团结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担当。这还要从方卓芬说起。”

方卓芬，广东惠来人，抗战前夕在上海大夏师范专科学校史地系就读。抗战爆发后，方卓芬在上海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1月，方卓



▲ 观众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 侯文斌 摄

► 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藏“方格子衣裙”

芬来到新四军泾县云岭军部战地服务团和速记班工作学习。

1939年春，周恩来来到皖南新四军总部作报告，对速记班同志们作的记录很满意，决定调方卓芬、吴博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周恩来利用休息时间向她们阐述了学习对革命的重要性，鼓励她们在工作之余抓紧时间学习社会科学和马列主义。谈话中，周恩来注视着她们身上的军装，沉思一下说道：“你们穿这样的服装到后方去是不妥当的，会引起特务的注意，要换上便装才好。”于是，周恩来让副官给了她们40元制装费。方卓芬后来去重庆工作，一路上省吃俭用，用省下的钱买了两段料子，然后自己动手裁剪，做出了这套漂亮的衣裙。

据了解，当年，面对国民党顽固

派的经济封锁，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原本预计每年每人一套单军衣，由于经费困难未能实现，最终只发了两次衣裳，一次是用新四军送来的一批灰布给每人做了一套军衣，另一次是发钱每人做了一套便装。在抗战的环境下，女工作人员要想有一套漂亮得体的衣服很难。所以，当方卓芬穿着这套衣裙来到红岩时，显得格外亮眼。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环境里，外出办事人员衣着必须整洁和讲究。为了便于大家工作和树立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方卓芬大方地将这套“方格子衣裙”贡献出来，供办事处的每一位女同志使用。据介绍，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女同志们从此轮流穿着它外出办事，参加妇女慰劳

总会各种社会活动和有关会议，并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出入各种社交场所。后来，这套“方格子衣裙”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女同志外出的“公用礼服”。久而久之，这套衣裙掩护了很多同志的不同身份，保证了很多特殊任务的完成。新中国成立后，这套衣裙一直由方卓芬珍藏，之后捐赠给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相关负责人说：“纪念馆每年接待观众数百万人次。观众每每看到这套衣裙，都会因好奇而驻足，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后，因敬重而驻足。”

革命文物巡礼



在新疆哈密市的一个小村庄，有一个热爱传统刺绣的汉子卡德尔·热合曼。因为手艺精良，又是一名“男绣郎”，卡德尔在当地小有名气。

卡德尔对刺绣的热爱源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在他的家乡哈密，刺绣是当地的传统手工艺。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绣娘，卡德尔从小便受熏陶。7岁时，他就能画些简单的刺绣花卉图案。让卡德尔真正决定投身刺绣事业的是他的家庭变故。35岁时，卡德尔的姐姐因病去世。从那时起，孝顺的卡德尔决定替代姐姐，传承家族刺绣技艺。

如今，因为刺绣事业，卡德尔不仅有了固定收入，还带动周围村庄的上百名绣娘组成专业刺绣团队，牵头设计了抱枕、花帽、旗袍等超过300款的民族刺绣新产品。

图为卡德尔·热合曼(中)近日在哈密传统工艺工作站驻家官手绣工坊，将新的订单交给与其合作的绣娘，并为绣娘讲解制作要领。

新华社记者 王菲 摄

手迹类文物复制临摹有讲究

吕雪菲

文物复制是依照文物的体量、形制、质地、纹饰、文字、图案等信息，使用原工艺、采取原工作流程，制作与文物相同的制品。博物馆中文物复制主要有以下目的：一是弥补馆藏文物的不足；二是替代文物原件展出，避免珍贵文物在长期陈列展示中受到损坏；三是回馈文物捐赠单位或个人，为文物征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四是进行馆际交流，扩大受众群体。文物复制不论是从技术手法还是保护角度来讲，都是文物保护工作的延续，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手迹类文物复制技术。

博物馆手迹类文物的复制临摹主要包含毛笔、硬笔手迹临摹，印刷类模版的画样稿以及手绘图案的复制临摹。直接摹写为主，做字为辅的合成效果法，在传统双钩填墨法与一笔摹写法基础上发展形成，是使复制件可以与原件达到形神兼备效果，具有更多可操作性的技术方法。

直接摹写是以接近“一笔书”的

操作，再现原字的用笔形态，在没有双钩线约束下做到这一点非常难。毛笔在字影中运行，如何同时兼顾四周边缘的位置与墨色变化，并保证使笔墨既不出边，又不亏欠，这涉及对边缘中实线定位、笔的软硬、纸的厚薄、墨的浓淡、笔势关系、笔力虚实等一系列分寸的综合把握，要解决这些问题，临摹者需进入主动临摹状态，即自觉驾驭原迹用笔的高级技术状态。其特点是以有所兼顾的用笔，一笔准确摹写出既定的笔道形状，同时带出相应的墨色变化。主动临摹状态的运用，除了必须具备扎实的书法功底外，还需要通过字迹分析、选纸、选笔、选墨、对临、试摹写等方面的经验配合完成。只有将临摹的前期工作准备好，通过充分的试摹，在字影、印象、手感、笔感循环往复的操作中感到适应，对比试摹写的效果与原迹基本一致时，在心、眼、手、笔浑然一体的最佳时机开始摹写，做到心无旁骛一气呵成。

单纯的直接摹写并不能很好表现原作风貌，手工复制临摹对精细化程度要求高，由于工具材料的限制和书写者偶然因素产生的效果，很难做到

笔笔到位。因此，做字的效果处理和补笔补墨是不可缺少的工艺性方法。在毛笔墨迹的复制临摹中，常用的一些工艺性做字方法有分笔描墨法、干笔锋的制作方法、墨迹洇痕的书写方法、墨迹一笔深浅不同的处理方法、跳动走笔法、墨迹补笔补墨修整法等。

硬笔手迹是近现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其中，钢笔字迹的摹写关键在于工具的选择和墨水的调配，这是直接影响字的结体线性和描摹准确度的两个材料因素。钢笔字迹因为年代久远，大部分褪色、变色，如何准确调配旧色是一大难点。铅笔字迹和钢笔字迹类似，选择工具和颜色、判断铅笔颜色的型号非常重要。铅笔字迹在摩擦过程中易产生摩擦的痕迹，真实再现这种痕迹有两种方法，即用棉花或是橡皮擦。

关于布料书写的字迹，因墨与布料结合的特性与纸张有很大差别，书写落墨时，需要很好掌控用笔和落墨的节奏。幅面大、字迹大的墨迹的含墨、含水量很大，布料的洇水特性比纸张慢，落完墨后还会不断洇，所以要事

先试临摹，了解它的最大洇痕范围，这样才能很好地掌控含墨、含水量。另外，丝绸上的书写还要注意布料本身的纹路，洇痕会随着纹路洇开，所以书写时要注意纹路方向和原件保持一致。修整洇痕时也要顺着纹路下笔。

关于清稿描样和手绘图案的复制，清稿描样是为了解决印刷或是雕刻图案、印章时，模糊制版的难题。这是在制版前采取的一个技术措施，即先从模糊状态里提取出清晰准确的图文样式，并按文物原件原貌重新绘制墨稿，然后按1:1的比例制版；手绘图案的复制性临摹，关键是要保持线条的爽利与规矩。

总之，博物馆手迹类文物的复制性临摹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复制性，要尽量按照原件的形状和质地和工艺做复制品；二是工艺化、精细化，临摹复制整个过程要在不断求真的状态下进行。手迹文物的复制，不同于作伪与仿制，它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手段，目的是真实再现原作风貌，要求纤毫毕现、神情俱似。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馆员)

黑龙江曝光11起文物法人违法典型案例

本报讯(驻黑龙江记者张建友)2018年7月，哈尔滨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在巡查中发现，哈尔滨市依兰县慈云寺管理部门未经文物部门审批，擅自修缮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慈云寺，明显改变文物原状。哈尔滨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责令停工改正并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

7月6日，记者从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为加大文物执法力度，严肃查处文物法人违法案件，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其官方网站通报了2016—2018年全省文物法人违法典型案例11起，包括：哈尔滨市中东铁路俱乐部旧址违法修缮案、哈尔滨市伊维尔教堂保护范围内违法施工案、哈尔滨市呼兰龙王庙旧址违法修缮案、哈尔滨市秋林商行旧址违法修缮案、依兰县慈云寺违法修缮案、齐齐哈尔市五教道

德院建设控制地带内违法工程案、双鸭山市仁和遗址群一仁合南山城址违法施工案、集贤县太林东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违法施工案、绥棱县绥化地区五七干校旧址违法拆除案、肇东市五里木站中东铁路建筑违法拆除案、虎林市军垦850农场老场部旧址违法拆除案。

据了解，这是黑龙江省2016至2018年间，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开展的全省文物法人违法案件专项整治行动的成果。

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向全社会公开通报这11起具有典型意义的文物法人违法案件，以达到警示、教育目的，下一步将加大对文物法人违法案件打击力度，进一步严肃查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文物法人违法案件，坚持零容忍态度，坚决予以打击。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施行

本报讯(驻福建记者黄国勇)2017年7月8日，“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中建成功两周年之际，经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7月8日正式施行，每年7月8日被定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日”。《条例》对鼓浪屿保护管理中所面临的困境，从规划与管理、传承与利用、共享与保障、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有针对性的立法规范，在实现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化、国际化中探索本土化经验。

《条例》明确了遗产管理机构，由厦门市政府确定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思明区政府负责，文物主管部门履职，其他部门协同配合；设在遗产区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其他有关单位，除受各自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外，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事项，应当服从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统一协

调和管理。《条例》明确，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生态文明建设规划、风景名胜区保护规划等各项规划之间出现不一致的，应当以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划为准，并对文化遗产的遗产区和缓冲区的9种行为进行明令禁止，包括未按照要求设置店面招牌、刻划涂污建筑、擅自改变建筑结构和用途等，尤其规定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不符合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专项规划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设施。

《条例》鼓励单位和个人在坚持保护优先原则下，参与遗产传承与活化利用，具体方式包括口授传承、书面传承、举办讲座论坛；展览交流与合作；家庭音乐会等文化项目；文学、音乐、美术、书法、摄影、戏剧、影视作品等创作；开发具有鼓浪屿特色的艺术品、纪念品等文创产品。《条例》还对居民共享文化遗产权益进行保障提出要求。

“许昌人”遗址发现已知最古老的人工刻划图案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桂娟)考古学家在河南省“许昌人”遗址出土的一个小骨片上发现了经红赭石涂染的7条平行刻划直线。这件人工制品距今11万年左右，比来自南非的最古老现代人的画作约4万年，可能是已知最早的人工刻划作品。

这项研究成果7月8日在线发表在国际著名考古学杂志《古物》(Antiquity)上。论文第一作者、山东大学教授李占扬表示，该发现或许能帮助人们了解人类使用符号和绘画的起源，而符号和色彩为语言、数学和艺术奠定了基础。

这件刻划作品是在河南省许昌市灵井村西一处古老的泉水遗址发现的。该遗址以出土两个许昌人头骨和大量古人类工具而闻名，被称为“许昌人”遗址。

2010年，李占扬主导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队在发掘第11文化层时，发现了这件小骨片。骨片大小类似小拇指，上边有7条平行的刻划直线。经过显微镜观察和实验室重建，发现这些线是用石

制尖状器刻划上去的，用力较匀，制作精细，局部有虚线的部分，其寓意不详。

“这里已经出土了3万多件碎骨片，但我从没见过这样规整的刻划图案。”李占扬表示，后来经拉曼光谱仪、能谱仪测试，发现刻划线上有红赭石染料残留，这令他感到意外。红赭石是一种常被用来制作史前洞穴画作的天然颜料，在许多史前遗址中也能见到被它浸染的动物骨骼化石。

随后，李占扬与研究早期人类行为的知名专家、南非早期人工画作的主要研究者法国波尔多大学考古学家弗郎西斯科·德埃里科一起对这件骨片进行了制作试验和进一步测试，认为这可能是一件早期现代人有意识刻划的作品。

此前被认为最早的人类画作，发现于南非东海岸边的一处洞穴遗址，是用赭石画在小石片上的9条纵横交错红线，时代距今约7.3万年。“许昌人”遗址发现的这件人工刻划作品距今11万年左右，比南非的作品约4万年。



为充分发挥廉政文化的教育、熏陶、浸润功能，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八湖镇纪委联合辖区内刘店子小学，将当地特有的莲花廉政文化与校内非遗糖画课相结合，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颗扣子”。近年来，河东区积极探索廉政文化插上非遗翅膀，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廉政教育。

图为7月5日，刘店子小学糖画手工课上，小学生们听讲创作廉洁主题糖画现场。程贺 摄